

长城瞭望

保持落实改革的韧劲和担当

■易长欣

移步易景。一项事业每往前走一步，所面临的情况不相同、要求也不一样。改革推进到今天，原则方针、路径要求、时间节点已经明确，更重要的无疑是韧劲，更关键的无疑是担当。具备抓铁有痕的韧劲和舍我其谁的担当，事不避难、一做到底，落实改革就能有质量、有成效。

部队一位领导描述：“困难从纸面上的概念走出来，已经坐在了我们的对面。”干部超编较多，如何既实现消肿又保留骨干？全新配属关系，如何提高指挥效率、增进融合深度？人员机构减少，如何应对并未减少的任务？小机关大部队，如何转变指导方式、更新抓建理念……纷繁交织、细微具体的一道道难题，虽然解决起来并不容易，却都是改革征途中必须打通的关卡。不能硬过去，就看韧劲有没有、肩膀硬不硬。

落实改革，决不是把上面定好的文件照章批转就能完成。无论是进退走留的说服，还是自身利益的切割；无论是运行模式的探索，还是惠及长远的打算；无论是能力素质的换羽，还是思维

方式的变道，都需要我们俯下身一步紧跟一步行、一锤接着一锤敲。“天下事，在局外呐喊议论，总是无益，必须躬身入局、挺膺负责，乃有成事之可冀。”改革的密集施工期，不看调门，但看身影。只有扑下身子真抓实干、挑起担子紧抓快干，才能垒好改革强军的一砖一瓦。否则，就会被道道山梁遮住眼、困住脚，前进不得。

改革的航船行进至此，低垂的果实已经摘完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。这个时候，最容易也最怕患上改革恐惧症、倦怠症、抵触症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在动奶酪的“利害时”、真刀枪的“攻坚期”，广大党员干部担责不误、临难不却、履险不惧、受屈不计，凝心聚力助推改革驶向下一段旅程。改革越深入，越需要韧劲和担当。但要看到，少数人也存在调门高、落实差的问题。他们或搞“内外有

别”，不管一致性只讲特殊性，动别人的奶酪可以，动自己的奶酪不行；或搞“难易有别”，对任务区别对待，只捡地上的麦穗，不采荆棘丛中的玫瑰。

改革，不是按下开始键就自然会开花结果，也容不得折扣搞变通。如果有认识没韧劲、有态度没行动、有能耐没担当，不落实、落不实的问题就不可避免。如果总想着皆大欢喜、四平八稳，把具体改革方案磨成一个一个圆鸡蛋，或者畏首畏尾、实效虚做，因自身利益可能受损而虚与委蛇，改革就会出现这梗阻那梗阻，甚至变形走样。这种状况，绝非广大官兵所盼，也绝非强军兴军所需。

陈云同志曾说：“一个共产党员，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，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，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……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待党

的工作，是绝对不允许的。”当此滚石上坡、较劲碰壁之时，我们必须坚定与改革共命运、以改革为己任、为改革做贡献的政治自觉，抱有不畏险途、不并微末、不舍寸功的改革意志，真正以慢不得、虚不得、停不得的韧劲和担当，推动各项改革决策和举措落地生根。

“思想再解放、改革再深入、工作再抓实”，做有韧劲有担当的改革实干家，必须要有这样的高标准、高要求。努力使思想活泛起来，让改革认识论、方法论与日新月异的改革实践相匹配；拿出真抓的实劲、敢抓的狠劲、善抓的巧劲、常抓的韧劲，矢志推动改革深入、再深入；着力搞好调查研究，把存在的矛盾困难摸清摸透，把每一项工作做实做深做好。这样一来，“坐在对面的困难”就自然会矮三分。

回首来路，改革深深的辙辙中刻着笃行的脚印；眺望远方，改革迢迢的征途上依然密布荆棘和难关。我们坚信，只要保持奋斗者、担当者的姿态，就一定能激荡改革新气象，开辟改革新境界。

内容更丰富
下载更方便

欢迎关注“八一评论”微信公众号



八一时评

「民族伤痕」容不得开玩笑

■徐绿山

拿民族伤痕开玩笑，舆论不会饶过，法律也不会放过。最近，两名男子因穿着日本军服在南京紫金山抗日守军碉堡前摆造型拍照，而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，并被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。

日军侵华血流成河，践踏生灵、屠杀平民，“罄四海之竹不足以书其罪，倾九天之水难以洗其恶”。那段痛彻肺腑的历史，中国人无论多少次走近、多少次触摸，都会感到无比沉痛和悲愤。两名男子的所作所为，常人难以理解。照片上，他们手持带刺刀的步枪，上面绑着“武运长久”旗。这面旗，是日军用于祈求战场上永久幸运的。在印染着中国人鲜血的抗日遗址前，身着敌人的军服，拿着敌人的旗帜，这难道不是是非不分？难道不是道德沦丧？难道不是良知泯灭？无怪乎，网上网下都很愤怒，都表示不能容忍。

值得警醒的是，这种愚蠢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发生。从南京燕子矶身着日本武士服、手举木质武士刀摆拍，到身着日军制服在上海四行仓库门口拍照，再到广西南宁穿着日本军装在黎塘镇街道、车站等公共场所“作秀”……与民族情感相悖、挑战公众底线的事屡有发生。个别青年罔顾历史常识，明明知道可能面对“人人喊打”，却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和思考。

当今时代，信息爆炸、观点多元、文化多样。“在泛娱乐化的潮流中，人们主张对事物和人物不作评价，尤其是不作道德价值上的判断。”置身这个时空中，年轻人追求个性和刺激的愿望膨胀，少数人更是偏激地坚持“与众不同”、做与众不同的事。“恶搞无底线、调侃无禁区”“只求好玩，不管其他”。正是在这种思想驱动下，他们的价值取向虚无化、道德取向去崇高化，直至一步步迈向民族情感的禁区。他们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浅薄和轻浮，是在给民族的伤口撒盐。

“不得体地对待历史，理应产生罪恶感。”以色列一位艺术家曾做过这么一件事：他挑选一些游客在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搞笑留影，并将图片中肃穆的建筑替换为大屠杀中真实的历史场景。背景一换，历史瞬间来到眼前，累累白骨、层层尸墙，游客的轻佻滑稽在里面显得极为刺目。这些图片传至网上，给人强烈的震撼。据换一下，此次穿日本军服在碉堡前拍照的两名男子，如果脑子里有抗日先辈宁死不屈、流血牺牲的场景，有侵略者狰狞凶狠、血腥杀戮的画面，他们还会认为拍出来的照片“有新意”“很好玩”吗？

历史是决不能忽略的背景。正如河床是流沙的不断沉积，任何时代也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。那些看似已经远去的痛楚和耻辱，那些我们曾经抗击的邪恶和力量，如果我们丧失痛感和警惕，它们就会以各种方式“复活”，对现实产生影响。昨天的历史不是今天的人们书写的，却一直近在身边。只有每个人都怀着温存与敬重，都为它做点什么，才能让惨痛的记忆不再重演，让美好的今天持续下去。

戏谑民族伤痕事件的频频发生，拷问着社会的历史观。历史观正确与否，关系人心聚散、国家兴亡、民族盛衰。在民族走向复兴、国家由大向强的关键期，我们有必要深思：我们应怎样对待历史？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教育？对于无底线消费历史、挑战民族共识的行为，该如何用制度来制止？这些问题，关乎我们的脊梁与骨骼、气节与气脉。保持清醒坚定地往前走，凝聚力量实现伟大梦想，就必须把这些问题回答好、解决好。

习主席曾指出：“历史和现实都表明，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，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，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。”希望每个中国人都有正确的历史观，对过往保持清醒和尊重，决不能让困难娱乐化、国耻戏谑化的事情再发生。

长城论坛

讲传统不可剔除血肉

■李晓明

春节期间，我们经历了一些很有仪式感的年俗活动。这些活动都是有“说法”的，年轻人问起来，老人会把前辈们讲给他们听的故事娓娓道来，这些故事有筋骨、有血肉、有魂魄。我们传统文化的根，就是在一代代人承接“说传统”的过程中守住的。

传统向来“风姿绰约”，而不是只有“骨感”。老人嘴里的故事之所以富有嚼劲，让人回味无穷、记忆犹新，就在于他们讲得很生动、有细节，故事虽很遥远，却让人恍惚如在其中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他们讲述的只是一种孤立的精神，那就很难给年轻人留下印象，更谈不上传承了。传统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，也镌刻着一支军队的基因和初心。今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，就是要向年轻官兵讲好我革命传统。

某旅曾做过一番调查。他们从不同的连队随机抽取战士，让战士们说出自己熟知的红色故事，并谈谈自己的思考，然而结果并不乐观。战士们的讲述，有的缺乏细节、模模糊糊，有的甚至连梗概都不准确。我们常说，既要知其然，也要知其所以然。知其然是前提，如果前提都立足未稳，后者就更难以做到。不深入了解我革命传统，要想把红色基因传承好，是不可能的。

需要反思的是，少数部队的教育者对党史军史不深入钻研、系统学，脑子里没有一幅生动、连续、丰富的传统图画。他们向官兵讲述的革命传统，是没有血肉、瘦骨嶙峋的，是缺乏活力、晦涩难懂的。丢掉那些极具精神魅力和生命力的东西，把精彩纷呈的革命传统讲成干巴巴的“四六句”，红色基因就会像缺乏滋养的种子，在传承中枯萎、凋零。

哲学家说：“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。”新时代的年轻官兵，每天接触的信息量大，只有先抓其眼、触其性，才能动其心。我们讲优良传统、讲初心使命，既要有“干货”，也要有“一棵一叶”。必须熟悉并用好鲜活生动的党史军史，把大道理由远拉近、化虚为实，让官兵在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中受到感染启发，才能不断增强教育效果。否则，就难以实现入脑入心。

能讲有筋骨、有血有肉的红色故事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带兵人不可或缺的一种本领。这种本领强了，就能让官兵从中感受革命先辈勇于牺牲、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，感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，感受言行一致、永不改变的本色和作风，进一步增强“传承红色基因，担当强军重任”的自觉性使命感，催生一往无前的强大力量。

机关干部随部队拉练，理应在细节上与基层战士“一个样”。然而，少数同志做不到。比如，拉练休息间隙，战士们席地拿着军用水壶喝水，他们却喝着自带的矿泉水。见此情景，战士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却会想：“我们不一样。”不经意间，密切上下关系就打了折扣。

这正是：上下高低都是兵，战士军装放大镜，你若总搞不一样，岂能人人一条心。

罗 园 图 蔺晨博文



谈训论战

思想决不能解除武装

■陈 军

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后，我军曾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整训，重在到治和平麻痹思想及战斗意志涣散，提出“决不能松懈斗志从思想上解除武装”。这一要求，至今仍是醒神的警钟。

因为进入相对和平环境，当时部队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产生了“歇一歇”的念头。有的希望早日回乡安家立业，过上“三十亩地一头牛，孩子老婆热炕头”的安乐生活；有的干部羡慕“灯红酒绿”的城市生活，开始讲排场、摆阔气；有些基层生产任务的部队刀枪入库，枪炮生锈，个别连队甚至半年不出操。经过整风整训，部队强化了战斗队意识，充沛了战斗意志。

任何一支军队，和平关都是一道难关。“反正不打仗，怎么着都一样”，受这种心态影响，备战打仗方方面面的工作容易变形走样，与真刀真枪、生死存亡的战场渐行渐远。时间一长，积习成习，这种心态与状态就会成为一种顽固习性。“故不良之军队，不经最大之痛苦不能治，和平积习危害之深、根治之难，世人皆知。古罗马军团、蒙古铁骑、满清八旗兵，这些都曾显赫一时的强兵劲旅，最后不都因为患上“和平病”、思想上解除武装，而走向败亡了吗？”

“先求敌而后练兵者，其兵强；先练兵而后求敌者，其兵弱。”脑子里装着敌情再练兵，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就强。相反，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准备，练兵备战就紧不起来、实不起来。“不求战而治兵”的做法，不但会浪费和平这个抓战斗力建设的有利环境，还会将已有的战斗力腐蚀掉。正如一位军事理论家所指出的：单方面准备战争，不仅避免不了战争，还会增加战争的凶险。

军人的世界，生活即战争、学习即战争、训练即战争。只有时时处处为打仗着想、为打仗准备，所习所学才是打赢的本领、才能战场上顶用。否则，一切都是无用功，徒费资源、浪费时间。明代戚继光曾告诫：“若夫百务废弛，且顾眼前妻孥之乐、宴饮之欢，至将事务耽擱，行伍废散，卒然遇变，束手受死，而为市曹之鬼，是自取之也。”军队因醉太平而吃败仗、受耻辱，是自食其果。正因为，每名立志打赢的军人，都必须让和平积习远离自己。

“餐霜尽是心头血，洒向千峰秋叶丹。”备战打仗是一场艰苦的跋涉，容不得精力偏移、分心走神。我军多年没打过仗了，但战争的离我们并不遥远。我们需要好好摆一摆、挖一挖，对“和平积习”来一番大起底、大扫除；需要强化忧患意识、危机意识、打仗意识，一心思想备战打仗的事情，一心学备战打仗的本领、一心练备战打仗的实功，使部队始终保持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必胜的备战状态。

玉渊潭

言路与才路

■铁 坑

吉项与武则天曾有一番关于“和泥”的对话，颇有妙趣和深意。

吉项问：“水上各一盆，两者有纷争吗？”武则天说：“无。”吉项说：“把水和土和成泥，会有纷争吗？”武则天说：“无。”吉项又说：“把泥分成两部分，一块塑成佛祖，一块塑成天尊，会有纷争吗？”武则天回答：“有。”

吉项“和泥塑像”的寓言，阐述的是皇族外戚各有分区才能相安的道理。那时，一场抵御突厥南侵的战争刚刚打完。尴尬的是，开战前征兵，诸州应征者寥寥。任命太子李显为元帅后，“吏人应募者，日以数千”。吉项是很有才力的大臣，假如他这番有预见、有智识的话起作用，皇族外戚“两不安”的局面或许能缓和些。

言路关乎集智，才路关乎用贤，两者大有关联。广开言路，不仅能发挥贤者之才，也有利于发现人才、留住人才。反之，堵塞言路，则往往使

未曾发现的人才望而却步、退避三舍，使已经得到的人才心灰意冷、喋若寒蝉，这无异于堵住了才路。

韩信亡楚归汉，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“数以策干项羽，羽不用”。然而，初到刘邦帐下，韩信同样不受重用，这就有了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之事。再次向刘邦举荐韩信，萧何提了两条建议：只授予他一般的将军，是不够的；大王向来不重礼节，但拜他做大将军，就必须择吉日、斋戒、设坛场、具礼。刘邦依了他。事实表明，韩信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，他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、攻必取，为刘邦夺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《大唐新语》中载，开元年间，张九龄曾为中书令。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将

那就会因小失大。当年，房玄龄向李世民推荐杜如晦，称杜如晦聪明识达、王佐之才，“必欲经营四方，非此人不可”。听完房玄龄的详细介绍，李世民大惊：“尔不言，几失此人矣！”在征讨四方、实现一统的战争中，杜如晦参谋帷幄、决断如流，立下赫赫功勋。

贞观初，杜如晦被任命为右仆射，李世民又告诫他：“你身为仆射，应该大开耳目，求访贤哲。如果忙于琐碎事务，目不暇给，又岂能为我求贤呢？”贞观朝开创封建历史一段鼎盛时期，与当时言路通、才路通，从谏如流、人尽其才是分不开的。

“有不竭的水流，就会有潮流而上的生机。”通常来说，言路畅通，才路就会通畅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言路并非是小溪般的，而是大江大河般的。“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；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”孟子的这番话，深刻讲述了“广言路以求贤哲”的办法。千百年来，用人制度经历了无数的变化，但这种观点和思想始终是合理通用的。

当然，不仅招贤纳士需要广开言路，加强监督也需要言路畅通。否则，辨识人才的工作量就太大了。三国时，诸葛亮曾任魏国吏部郎，谁向他举荐人才，他先把这事传开去再用。随后，被举荐者是否称职、是优是劣，连同举荐者一同进入“公议”，用大家的褒贬来作出评判。从此，“群僚莫不慎其所举”。这一招，实在是对了路子。